

清后期古州厅聚落分布与民族交往研究

杨妍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古州厅地处都柳江中上游枢纽地带, 置厅后受“改土归流”政策推行与水陆交通改善的推动, 苗、侗、汉等民族在此进一步交汇融合, 至清后期已成为聚落空间建构与民族交往的典型区域。本文依托方志资料建立聚落信息库, 考察清后期古州厅的聚落空间分布与形态特征。研究发现, 侗、苗、水、瑶、汉等民族在聚落高程分布上呈现垂直分层特征, 近半数聚落以山水方位命名, 折射出不同族群的空间认知差异。都柳江水道与古驿道网络构成区域交通骨架, 盐运与木材贸易推动了“沿路聚居”格局的形成。经济交流与市场网络的构建、文化交融与信仰空间的共享, 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深层整合。清代古州厅民族交往的不断深化, 为此后该地区形成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奠定了空间与社会基础。

关键词: 聚落分布; 民族交往; 古州厅; 清后期

DOI: doi.org/10.70693/202609018276

榕江, 地处都柳江中上游枢纽地带, 其前身为清雍正年间设置的古州厅。清雍正七年(1729年), 贵州巡抚张广泗剿抚古州, 次年正式置古州厅, 隶黎平府, 为清廷开辟“苗疆六厅”之一。民国二年(1913年)改厅为县, 更名为榕江县, 此后榕江之名延续至今。置厅之后, 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与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 外地移民陆续迁入, 苗、侗、汉等民族在此交汇融合, 至清后期已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地区聚落演变与民族交往的典型区域。

今黔东南州分南北两大水系, 北为清水江、潯阳河所在的沅江水系, 南为都柳江干流所在的柳江水系。学界关于明清黔东南民族地区的研究, 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北部清水江流域, 依托大量清水江文书, 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清水江学”。相比之下, 对南部都柳江流域的关注较少, 且研究偏重下游区域, 代表学者有黄瑜、王彦芸等。近年来, 关于都柳江中上游段的成果逐渐增多。李金兰、吴美桃指出, 清代以来以古州为中心的道路开辟拓展了王朝治理空间, 并强化了沿线各族的国家认同;^①王政、张应强认为, 光绪年间“千三”组织定款立碑为公山确权, 反映了清代古州山场确权中的地方逻辑与官民互动;^②杨正文、龙宁东则以榕江“宰牙四寨”为例, 揭示了古州置厅后多民族共居中小区域共同性的形成机制。^③总体来看, 现有成果从不同维度丰富了对都柳江中上游区域社会的认识, 但从聚落空间角度审视民族交往的研究仍相对薄弱。有鉴于此, 本文以清后期古州厅为研究范围, 在梳理其历史地理基础之上, 依托方志资料建立聚落信息库并绘制相关图表, 并从经济往来与文化交融两个层面, 分析清后期古州厅民族交往的具体形态与内在机制, 以期都为柳江中上游的民族交往研究提供一个区域性案例。

一、清后期古州厅历史地理基础与区位特征

榕江县地处湘黔桂交界地带, 都柳江及其支流寨蒿河、平永河在古州镇交汇, 三条河流在县域内连接南北、贯通东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高越山、八万山、月亮山三座主要山脉分布其间, 地形复杂。今榕江县民族构成多样, 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近八成, 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县。

榕江县昔称古州, 据光绪《古州厅志》的记载, 古州有内有外。清雍正年前建寨设州置长官司皆外古州, 榕江县境属里古州。^[1]清雍正七年(1729年), 贵州巡抚张广泗剿抚古州, 八年(1730年)置古州厅, 是年冬置古州镇, 雍正九年(1731年)次第剿抚上下两江及东、北各路苗寨, 最终圈定四路苗寨纳入古州厅辖。《黎平

作者简介: 杨妍(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① 参见李金兰、吴美桃:《清代以来都柳江中上游的道路开辟与国家认同》,《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3年第3期。

^② 参见王政、张应强:《从〈千三碑记〉碑看清代古州都柳江流域的山场确权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6期。

^③ 参见杨正文、龙宁东:《多民族小区域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以贵州榕江县“宰牙四寨”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府志》记载,“古州厅在府治西,在省城东南,其地与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同时建置,为新疆六厅。东至府属增营寨……界西北至丹江厅属牛皮箐……枕山面江,川原平衍,榕都二水两岸皆山帷,车江自乐乡以下至厅城几三十里之遥,迤迤漭漭,榕树参天,榕城所由名也。”^[2]结合此段记载以及今榕江县州内毗邻雷山、剑河、黎平、从江四县,另与丹寨、台江等县区也相距较近,东南部、南部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相接的地理位置情况可看出,榕江联络四方,占据关键的枢纽位置。

光绪《古州厅志》记载其疆域,“岗峦四绕,三江潞环,襟带楚粤,生苗巢穴,为黔省东南锁钥,新疆第一要区”,^[3]足见榕江县在交通布局及民族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对榕江历史的记载,同样体现出清王朝对此地战略地位的充分认可:

(榕江)在前清雍正初年,仍为苗、夷、水、洞诸边胞“不识不知”所在。当时有黎平府知府张广泗先生蓄意开拓边疆,乃以赴贵阳省会为名,假道榕江,侦察地形。于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始行开辟,定名为古州。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设古州厅,驻黎平府同知,即今之榕江县。^[4]

这段记载简单清晰地梳理了榕江在真正意义上纳入清朝西南边疆治理长远规划的时间节点。同一事件的记载,更早可见嘉庆《古州杂记》中“雍正七年,张经略广泗守黎平,以金币贿生苗,假道入省,因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呈请大帅购募通事,统兵安抚,留定其地,遂入版图”^[5]的记载。其中“假借榕江,侦查地形”以及“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体现了掌握榕江复杂地形构造之于开拓苗疆整体战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余泽春在《古州厅志》疆域部分的“论”环节以“若网在纲”与同时期贵州省仍较为普遍的插花地状况进行对比,对张广泗开拓苗疆的周密规划深表认同,并感慨其平定苗疆功业实永垂不朽,即“辟地之初,经画井井,一时之瘁,贻百世休”。^[3]

榕江县山峦绵延、江河纵横,地形构造复杂。嘉庆《古州杂记》载,“崇山密菁,鸟道羊肠,瘴疠繁兴,天时人事,迥与世殊”,^[5]山峦连绵,山路蜿蜒,加之气候影响下林木葱郁,瘴气萦绕,使榕江笼罩上一层神秘面纱。光绪《古州厅志》载,“古州蓊尔,地广轮斜,掬角各百数十里”,^[3]记录了古州虽为弹丸之地,但其疆域南北斜长、东西狭窄,各延展百数十里的地理情况。民国《榕江乡土教材》在榕江地理这一章节中,介绍了榕江县域内的平原区域,即县城附近以及由县城至忠诚堡、安乐乡一带以及朗洞一带的滨水之区。对榕江县山脉河流情况的描述为“全境山岭,均为苗岭南支,漫延于平永河与都江河流域之间”,^[4]并先后从走向、途经地等方面介绍了榕江县内主要山脉及三大河流的基本情况。在此需补充解释,平永河一名榕江河,蒿江即寨蒿河,一名车江,县核心农业区和人口聚居区——车江万亩大坝便是主要由寨蒿河冲积形成。

都柳江、寨蒿河、平永河贯通东西、连接南北,构建起榕江域内交通的基本格局。山峦与河流交错,奠定了榕江聚落“依山傍水”的分布特色。得益于八方通达的地理区位以及经渐次开发而便利的水陆交通,清代古州厅的人员迁徙、驿路建设、经贸往来与民族融合也在不断地蓬勃发展。

二、清后期古州厅聚落空间分布与形态特征

(一) 地名分类的空间表征

都柳江沿河两岸居住人群以“侗苗”为主,“高坡苗”、水族和汉人移民村寨交错分布于高山与平地之间。民间俗语描述为“侗住河边,汉住屯堡,苗、水住山坡”,呈现出高原山地中的沿河“峒地”(俗称“坝子”)居民与“山地”人群共居共生的现象。^[6]民国《榕江乡土教材》梳理了志书中关于榕江县村寨及人丁户口的内容,指出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为571寨,有31526户;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为455寨,有27289户。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14644户,52899丁口。《榕江县志》收录的东、南、西、北四路苗寨的名录与光绪《古州厅志》中苗寨的名录完全一致。经统计,光绪《古州厅志》中记录的有具体名称的苗寨共276个,与方志中“571”及“455”数字出入较大,《榕江县志》在编纂时,在四路苗寨分布对应的村寨名录最后均加上了“等寨”来处理该问题。

借助1987年版《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新修《榕江县地名志》初稿、《古州厅志》2024年点校本、榕江文史资料系列书籍以及从江、黎平等榕江周边县的地名志等方志资料;以及“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百度地图·拾取坐标系统”等相关地名及定位数据网站,笔者整理出“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以呈现聚落位置、朝向、经纬度坐标、形状、地形、主体民族归属、地名分类等信息,并作为后续系列分析的基础数据来源。光绪《古州厅志》收录的四路苗寨中,部分村寨有特殊标注,其中标注最多的信息为“生苗”,标有该信息的村寨有19个,在“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中考证出今在榕江县辖境内的有俾柳、分引、加溪、赧冷、加坳、俾勤、加早、乌将、俾拉、俾亡、拉力、岩寨、水彭、水尾、拉已、滚通共16个村寨。此外,还有部分关于设汛、关卡、驻地、界属等的标注。结合《古州厅志》2024年版点校本对苗寨部分的校注可知,光绪《古州厅志》收录的东、南、西、北四路苗寨中,岭转、归你、下绍、上绍、归七、岑门、岑梗、归西8寨今属黎平县辖境,俾九和俾打2寨今属从江县辖境,其中俾打寨在光绪《古州厅志》中就有标注“下江界连”。《古州厅志》收录有具

体名称的 276 个村寨中，笔者通过多方信息印证及部分合理推测，可复原聚落有 210 个，占比约 76%，可依据地名解读进行分类的聚落有 188 个，占比 68%。两项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二，达到可进行总体分析的标准。

在“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中，笔者主要结合《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中对应的地名解读内容及“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网站对部分地名由来的详细解释，笔者将 188 个依据地名解读进行分类的聚落，在地名类型上总体上分为姓氏居民、建筑、位置、规模方位、动植物、寓意、地形地势、事件传说、建立时间 9 个大类，其中“位置类”又可细分为山、水、田、石、其他 5 个小类。由于部分村落名称的选用融合了两个类别的内容，如母香寨的地名释义为，“侗语“母”为每个人，相传很久以前，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制作敬神用的香，且居住在溪水的上方，故名”。涉及事件、方位两种类别，故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将其拆分为 0.5 个以事件命名的聚落和 0.5 个以方位命名的聚落，以尽量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分类工作完成后，通过比对不同类别村落地名数量在总体村落数量中所占比例，发现位置类地名在聚落地名选用时出现概率最高，约为 49.5%，其中又以位置（山）类占比最高，在位置类地名中占比 50%，其次是位置（水）类，在位置类地名中占比约 30%。这两类位置地名中，“山”类型集中表现在中带“高”“岑”“格”“岭”“俾”等苗语、侗语当中表示“山”的标志性字词的聚落地名，如高冈寨、岑归寨、高格寨、岭倍寨、俾计寨等。“水”类型集中表现在中带“孖”“江”“旧”“雅”“赧”等苗语、侗语、水语当中表示“水”的标志性字词的聚落地名，如孖萎寨、江边寨、高旧寨、高雅寨、高赧寨等。另有与位置（山）类有所关联的地形地势类，在整体地名中占比 12.5%。人文地理类，即主要包含上述 9 个类别中的姓氏居民、建筑、寓意、事件传说等，对应聚落整体占比约为 33.5%，而其中又以含汉族主居的聚落为主，地名选择也受到汉族历史习惯的深刻影响。如孟潘寨，即对应今古州镇头塘村，《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对其的地名释义为，“《古州厅志》称此寨名孟潘，置左营孟潘塘，称左营“第一塘”，头塘称谓由此而来”。^[7]另有地名网上对怎丢寨地名释义可作为汉族移民入居榕江的直接体现，光绪《古州厅志》称“怎丢”。苗语“丢”为客家，“怎”为寨，意即主要为汉族居住的寨子。

总体而言，榕江县聚落分布与自然环境关联密切，大多数情况下以山水位置为基地择地而居。细化计算结果可推导出，清后期古州厅聚落命名差异映射出当地族群空间认知不同范式，即苗侗族群依托山川河流构建空间认知坐标，汉族则侧重社会关系与集体记忆的符号化表达。

（二）高程分布与族群分层

榕江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结合“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中收录的源于《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诸多村落的高程信息及地理环境记载，对应村落主居民族归属并结合此前地名释义部分的解读，可看出，聚落的高程分布呈现出显著的族群垂直分层特征。

表 1 榕江县少数民族特色村落高程及位置信息表

编号	村寨名称	主体民族	高程	位置
1	大利村	侗	750 米	大利溪边
2	定弄村	侗	890 米	山脚
3	票寨村侗寨	侗	615 米	山谷溪边
4	晚寨村	侗	645 米	山间脊地
5	乌公村	侗、苗	380 米	溪边
6	卡寨村	苗	565 米	山脚
7	宰荡村	侗	900 米	狭长稍坦谷地，溪流穿过
8	苗兰村侗寨	侗	830 米	
9	归柳村	侗、苗	730 米	山间
10	滚仲村	苗	470 米	山岭
11	脚车村苗寨	苗	680 米	溪边
12	怎东村瑶寨	瑶	620 米	山腰
13	八蒙村	水	300 米	河岸
14	摆贝村	苗	650 米	山岭
15	加宜村	苗	760 米	孔明山西侧，山腰
16	丹江村	苗	680 米	
17	三盘村	苗	700 米	山间
18	高兴村	水	620 米	半坡、谷地冲沟处
19	寿洞村	侗	370 米	
20	乔勒村	侗	775 米	溪边
21	大瑞村	侗	490 米	半山
22	本里村	侗	800 米	溪边
23	保里村	侗	780 米	较平坦的本里坝上
24	高略村	苗	870 米	
25	纯厚村	汉、侗	680 米	岑命坡脚
26	高鸟村	苗	680 米	山岭
27	同流村	水	850 米	山脊
28	计水村	苗	570 米	山脊
29	硐里村	侗	625 米	沿溪

数据来源：榕江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7年。

结合表1可知，汉族主居聚落则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的低地河谷，如位于都柳江右岸的八吉寨，通舟楫，与下江厅接界。乾隆二年（1737年）在古州厅安屯置堡，大量汉民迁入古州。后来，一些商贾、削官为民者或逃荒者、投亲靠友者相继进入古州定居。^[1]乾隆三年（1738年）设八吉、腊亮塘及铺进，为王岭左营辖地。^[7]体现出汉族聚落注重经贸交通区位的特征。侗族聚落集中分布于海拔300~600米的河谷地区，如寨蒿镇乌公侗寨位于溪流环绕的幽谷中，栽麻镇大利侗寨顺利洞溪而建，显现出亲水定居倾向。这一区位选择也使得侗族聚落伴有稻作经济优势，例如车江万亩坝区水田，极大地支撑了糯稻种植。结合图表内容，可看出水族聚落多分布于海拔300~500米的都柳江支流河谷及河岸台地，如兴华水族乡八蒙水寨依山而建，傍水而居，保留干栏式木屋群落与水上花桥，其选址体现出渔耕并重的生计策略。瑶族聚落则集中于海拔600~800米的山区，如塔石瑶族水族乡的怎东村瑶寨，多建于山腰平台且保留梯田耕作系统，瑶族有着长期依山游耕的传统，月亮山区的地理环境符合瑶族自身的生计传统和文化适应。苗族聚落则多分布于海拔700米以上的山脊地带，如计划乡加宜村海拔826米，房屋依山而建。结合清代开拓苗疆剿抚苗寨的历史背景以及清廷屯堡政策，可进一步理解榕江县苗族聚落高山避患的防御策略。光绪《黎平府志》记载：^[2]

古州自开辟以来，于雍正六年清理苗疆等事案内，原招抚苗民五百七十一寨，计三万一千五百二十六户。十三年，逆苗包利、红银结众悖叛，大兵剿抚后，将逆苗绝产议堡安军，是以寨分户数与原报之数不符。熟苗曩亦不驯，渐摩日久，悉安耕凿。“十三年，逆苗包利、红银结众悖叛，大兵剿抚后，将逆苗绝产议堡安军”。

清廷将参与反抗的苗民的土地视为“逆产”没收，并用于安置屯军。在这一时期清廷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和“屯堡安军”措施的影响下，低地的驿道节点和肥沃坝区被屯军占据。如海拔约250米，作为都柳江航运起点的古州厅城以及海拔约370米，控制寨蒿河粮道的寨蒿汛，均成为汉族屯军的关键据点。这些据点交通便利，有利于军事控制和商贸活动。与之相对，原居于较低海拔地区的苗侗族群，其土地被侵占，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被迫向生存条件更为艰难但易于防御的高海拔山区迁移。如《良化杨氏清白堂家谱》中就有杨氏先祖于清中叶由江西吉安迁到贵州黎平，而后从榕江乌婆（杨安冲）迁到良化的记录。乌婆和良化均属平江镇辖，乌婆地处溪边坝区，而良化地处山区。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策略对榕江县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历史影响。

总体而言，高程分布本质是各族群资源博弈的空间投射，苗族以高度换取安全防御，侗族以亲水换取农耕优势，汉族以区位换取商贸便利，而水族与瑶族则分别沿袭河谷渔耕与山地游耕的传统模式，清代屯堡政策通过土地分配制度强化了这一垂直分层格局。

（三）聚落密度的交通导向

明朝建设驿道的主要目的是军事，也以驿道为主线营建卫所聚落，使得原住少数民族村落分布在建设辐射区域之外，但由于驿道的经济属性促使黔东南传统村落靠近，形成的顺势相持的分布形态。^[8]伴随着区域安定环境下，经济往来需求的逐渐增大，驿道的经济属性逐渐凸显，甚至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承担主要功能。据光绪《古州厅志》中记载，古州地处万山丛中，尽占天然险要，朝廷在此设官驻军，规制极其森严完备，然而“芦笙一吹，箐狐四应，将帅奔命，久乃克之”，^[3]由此感慨固守险要之地，与严密的军备相比，更关键的在于合理的治理。这一论断的现实依据就包括滚仲苗民在清雍正八年及咸丰五年两次爆发苗民起义。第一次起义具有反清抗暴性质，是由苗王构磨糯带领的滚仲十二寨苗民对开辟新疆过程中暴虐征讨苗民，攻入“嘎良”（今榕江县城所在地）和“固虾”（今车江）^[9]的武力反抗。第二次起义具有反阶级压迫与反民族压迫性质，是由苗王构顾带领的滚仲汛苗民掀起又一次武装抗争行动，是对这一时期“新疆六厅”以苗民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清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的现实回应。由此可知，哪怕是有军事机构塘汛的设置，也不能靠武力征服实现长久治理，铺递驿道对长久统治的深刻贡献更在于其对于人员物资的服务性功能。

依托光绪《古州厅志》收录的铺递、塘汛、场集名录，结合多方资料对对应位置的考证，笔者绘制了图1以直观呈现清后期古州厅铺递、塘汛、场集的分布情况。由图1可看出，清代古州厅的聚落密度与交通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耦合特征。在上述三类要素中，铺递作为驿道系统的核心节点，主要沿都柳江干流及寨蒿河、平永河等支流布设，形成了“一纵三横”的交通骨架，这一骨架与今天榕江县主要道路格局大致相当。由在城铺、口月铺、乐乡铺、塘冷铺、岭贾铺、寨蒿铺、高婆铺、高表铺、色同铺、巨里铺、朗洞铺、孟潘铺、都江铺、八旧铺、八开铺、寨比铺、革椒铺、定旦铺、高长铺、高孖铺、高旧铺、俾倍铺、平宇铺共23处铺递构建起的榕江县交通网络，在清后期不仅承担着“通滇达粤”的军事驿传功能，更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物质通道。“沿路聚居”模式在榕江县都柳江航运节点表现尤为突出，如八吉寨物产富庶，水旱两路四通八达，系“古州门户，粤盐入黔首站”，沿江形成了较长的商贾聚落带，侗族“临水结寨”的传统与汉族商埠在此交融共生。

木材贸易的繁荣则进一步强化了水道导向的聚落集聚。榕江沿河两岸、岭上岭下，漫山遍野都栽有郁郁葱葱深受各地用户欢迎的优质杉木。自月亮山集市贸易开始后，汉人进入山区腹地采伐木材增多，山区的高同寨、沿江的腊西、八开、庙友、定旦都相继开设店铺。^[10]咸同苗民起义时期，迫使土司及汉人撤离山区，集市贸易也随之萧条。光绪初年，土司衙门重建，汉人木材商复入山区采伐，这里的贸易集场又相继兴起，较为新、近些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山区，大大地吸引了苗、水人民对贸易集场的兴趣，更多的农副土特产品上集市交易逐年增多，月亮山区的集场贸易又一次出现繁荣。^[10]月亮山区木材贸易的案例表明，交通路线在串联起地理通道之外，同样承担起了民族经济网络的建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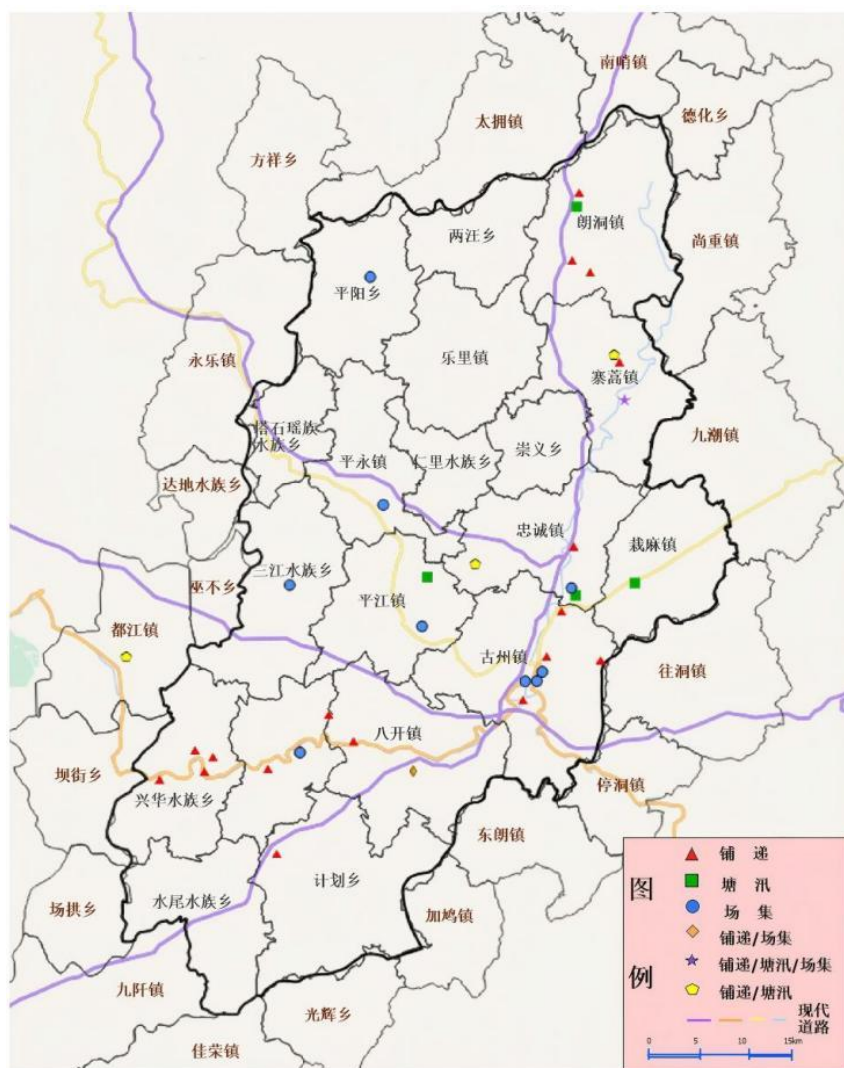


图 1 清后期古州厅铺递、塘汛、场集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三、清后期古州厅民族互动交往形式与互动机制

（一）经济交流与市场网络构建

清代古州厅的民族交往首先表现为深度的经济交流。据嘉庆《古州杂记》记载，雍正年间开辟苗疆后，贵州省由食川盐改食粤盐，粤盐由广东经水运至古州。乾隆年间，清廷在古州设有总埠，在黎平，丙妹、三脚屯设分子埠。这一时期，“境内，除镇标兵丁及屯军外，悉系苗人流寓，汉民绝少”，^[5]故合时宜地推行“苗汉一体行銷”政策，直到咸同年间（1855—1873年），苗族农民起义，古州“官盐”停止，到清末食盐仍是官办专卖。稳定的供需平衡、严格的物流管控，盐道成为多民族贸易的重要走廊。

清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鄂尔泰上奏请令兴立市场。于是，八开土司通晓各寨规定“卯、酉”在八开设厂，“巳、亥”日在定旦设厂，进行集市贸易。^[10]清乾隆年间，各省会馆相继在古州建立，古州地区以古州市场为中心的城乡市场贸易进入繁盛阶段。正如《古州厅志》所述：“水陆通衢的古州，有粤、桂、楚、闽商人来

往日增，贸迁成市，各省俱建会馆，衣冠之物，日渐饶庶”。^[11]光绪《古州厅志》记载了 11 个场集，即南门城外厂、旧米厂、新米厂、忠诚堡、定旦厂、平永厂、平江厂、寨蒿厂、八开厂、怎冷厂和羊色厂，对应的分布情况可见图 1。由图可知，清后期古州厅场集呈现出以厅城为枢纽，主要沿境内三条主要河流分布的态势，且部分场集的区位选址与铺递、塘汛有所关联。如寨蒿厂、寨蒿铺、寨蒿汛三重功能的机构集中设置在寨蒿城，市场功能辐射周边广大区域。忠诚堡场“苗侗售米，汉商鬻布”，八吉场“水族贩鱼，瑶民输药”，榕江县市场运作逐渐显现出专业化的民族分工。

咸同战乱延绵长达十八年之久，殃及古州大部分地区。光绪初期十年，战乱停息，古州农工商业逐渐复苏，这时“古州商贾汇聚，百货流通，城内商肆鳞次栉比，镇外设有场坝，按行互市”。^[11]清后期古州厅多民族市场上，语言使用方面呈现混合特征，如侗语称“斤”为“斤”，苗语称“元”为“贯”，却在交易中统用汉语“斤两”“银钱”计价。在忠诚，除常年经营的商铺外，更有如棉花场、梨场等独具特色的时令场，这类市场一般以特定物产的生长期为依据，择其成熟期开设场市，^[12]侗、苗、汉、水等多族人群在此期间互通有无，交易买卖。伴随着多民族市场网络的形成，清后期古州厅民族交融也得以进一步深化。

（二）文化交融与信仰空间共享

“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地名释义部分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之间的事件传说，例如上绍寨与下绍寨的地名记载，“绍洞原为苗族聚居之地，后来，侗族由镇蒙迁来相邻，因与苗族协商不下，双方以弓箭射鹭（鹭称白绍）比武定之。结果侗族射中飞鹭眼，苗族只射中飞鹭身，苗族只好履行诺言，让侗族为邻定居，绍洞侗语原称‘绍蒙’‘镇绍’”。^[13]射鹭比武的仪式与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狩猎传统相关，这一案例生动说明了不同民族之间交融混居的历史渊源。

在侗乡有句俗话：“gaeml mags sax, gax mags miiuh”。意思是“侗家萨大，客家（汉族）庙大”。其中，“萨”即萨坛，“庙”即庙宇，意为客家崇拜庙，侗家崇拜萨；侗家萨坛的神威和汉族庙宇的神威同样大。三宝侗寨中的侗族，除传统大姓杨、吴、石等姓氏外，诸多外姓姓氏居民是清代开辟“新疆六厅”之后迁入的。属于三宝“中宝”的口寨，至清道光年间，当地祭祀“萨玛”场所的建筑空间和形制经历了由山腰至平地、由神坛向祠宇转变的多重演变过程。其中，“鸡卦神坛”形制，即与都柳江下游寨稿村中“苗人”迁移后留下来的“萨坛”极为类似，又与明代官方规定的，即汉人传统的“社坛”形制十分相似。清代“萨玛”坛祠形制的变化过程，也正是外来移民逐步进入“侗苗”村寨在信仰层面上的一种折射。^[6]这一案例，印证出当地民族交往交融，在文化层面还表现为仪式空间的重叠与共享。

榕江县多民族文化交融还体现在纹饰图像与信仰礼俗方面。经实地调研发现，与清水江中上游一样，榕江县苗族银饰中的许多部件与图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运用如龙、凤鸟、狮子等神兽图像，毳路纹、鱼纹、石榴纹、麒麟送子、野鹿衔枝等吉祥纹样，八仙、福禄寿等仙道图像，寿字纹、“长命富贵”等汉字纹样^[14]，苗族银饰的元素日趋多元。这不仅顺应了市场发展，也持续丰富着其自身的艺术与文化内涵。信仰礼俗方面，当地汉族吸收了侗族的“树神”观念，在古州文庙旁植“风水林”并效仿侗俗礼俗定期祭祀，正对应了乾隆《百苗图》所记述的“苗汉渐通，俗相染”的民族交融状况。这种双向的文化采借，同样可在都柳江流域广为流传的《海八》古歌中得到印证。“各族在一起，汉女嫁苗人，苗女嫁汉人，来树个崖理，治理好村寨，治理好村寨……苗死汉也哭，汉死苗也哭”^[15]。《海八》古歌歌词所对应的叙事情感，正是对这类多民族共生性文化心理的文学性表达。

四、结语

清后期古州厅的聚落分布与民族交往，是在特定的自然与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本文基于方志文献建立的聚落信息库，从空间分布、高程分层和交通导向三个层面，梳理了聚落形态与民族互动的内在关联。研究表明，古州厅聚落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的总体格局，其空间分布深受自然地理与交通网络的双重影响。地名分类统计显示，近半数聚落以山水方位命名，反映出苗侗族群依托自然环境构建空间认知的特点；而汉族聚落的命名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关系与集体记忆，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聚落高程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族群垂直分层现象：侗族聚落多集中在河谷地带，利于稻作经济发展；苗族聚落则分布于山脊高地，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汉族聚落多据守驿道节点，便于掌控商贸脉络；水族与瑶族则分别延续了河谷渔耕与山地游耕的传统。在民族互动方面，都柳江水道与驿道网络构成了交往的物质基础。铺递、塘汛与场集的空间耦合，推动了沿路聚居模式的形成。盐运贸易催生了“苗汉一体行销”的政策，木材流通则带动了山区集市的繁荣，场集中语言的混用现象是多民族市场网络形成的生动写照。文化层面的交融同样深刻，三宝侗寨萨玛祠形制的演变，融入了汉、苗、侗等多民族元素，体现了不同神明信仰间的相互借鉴；古歌唱词所呈现的跨族群共感，同样印证了当地文化共生的历史事实。综上，清后期古州

厅的民族交往,以经济交流为基础,以文化交融为纽带,以制度调适为保障,塑造了依路聚居、因市成簇的空间格局,催生了多民族共存共生的社会意识,为理解都柳江中上游地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区域性案例。

参考文献:

- [1] 《榕江县志》编纂委员会.榕江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137.
- [2] (清)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7.成都:巴蜀书社,2006:16,191
- [3] (清) 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古州厅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4 (点校本) :25,61.
- [4] (民国) 李绍良.榕江县乡土教材[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325,328.
- [5] (清) 林溥.古州杂记[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6:236-237.
- [6] 黄瑜.“社祭”传统与“萨玛”坛祠——都柳江流域的村寨空间、生计变迁与国家制度[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4).
- [7] 榕江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M].内部资料,1987:19,61.
- [8] 杨光磊, 范金煜, 杨霖, 等. 明代军事建设对黔东南村落分布特征影响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4(5).
- [9] 周年荣.清溪仲苗民起义[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48.
- [10] 杨国刚.月亮山区集市贸易概况[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993:36-37.
- [11] 龙见霖.榕江集市概况[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2-3.
- [12] 周光奇.忠诚商业的前前后后[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48.
- [13] 黎平县人民政府.贵州省黎平县地名志[M].内部资料,1985:311.
- [14] 王星星,陈敏.以图表意:清水江中上游苗族银饰的图像基因[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2).
- [15]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局.融水苗族十二大古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

Study on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nd Ethnic Interaction in Guzhou

Subprefec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ng 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Guzhou Subprefecture was located in the pivotal area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Duli River.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driven by the gaitu guiliu(replacement of native chieftains with regular officials) polic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land transportation,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Miao, Dong, and Han achieved further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is region.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zhou Subprefecture had become a typical region of settlement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interaction. Based on local gazetteer data,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ettlement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examin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s in Guzhou Subprefec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Dong, Miao, Shui, Yao, and Han exhibited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elevation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and nearly half of the settlements were named after the orientation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reflecting differences in spatial cognition across ethnic groups. The Duli River waterway and the ancient post road network constituted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framework, while salt transportation and timber trad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a "settlement aggregation along transportation routes" pattern. Economic excha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networks, along with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sharing of religious spaces, further facilitated the deeper integra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thnic interaction in Guzhou Subprefectur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aid the spatial an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ethnic pattern in this region in subsequent periods.

Keywords: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ethnic interaction; Guzhou Subprefecture; late Qing Dynasty